

揭开反孔斗争史上崭新的一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曙光，划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夜空，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的风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广泛的传播，工人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揭开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千百年来反孔斗争史上崭新的一页。无产阶级的文化生力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把反孔斗争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军，向“孔家店”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对尊孔复古的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纷纷出版进步刊物，“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响彻全国，反孔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基础。正如毛主席所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制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

在“五四”文化革命时期进行的这场意义重大的反孔斗争中，“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新民主主义论》）鲁迅自觉地把参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孔斗争，作为他执行彻底反帝反封建战斗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在文化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了杂文这种“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新的文体，无情地揭露批判了以林琴南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后来又跟以“学衡”、“甲寅”为代表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主义派别进行了斗争，同时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批评。这些杂文，都是有力地打击形形色色尊孔派的“匕首”和“投枪”，铭刻着清晰的“时代的眉目”。同样，他听从革命将令，适应当时批孔反儒的现实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对旧中国传统思想的顽固堡垒“孔家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判，充分显示了“五四”文化革命的伟大业绩。他的小说集《呐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彷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同他的杂文一起，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树立了“巍峨灿烂的巨大纪念碑”。

“文学是战斗的！”“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重要的一翼。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短篇小说，就是在这种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革命风暴中被人们所运用，同时也在不断的战斗中遭到了尊孔复古势力的压迫和陷害的。正如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且介亭杂文》）一文中所指出的：

……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压迫和陷害。

鲁迅这里所说的要求“人性的解放”，正确地概括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文学创作存在的普遍倾向。而鲁迅的小说，虽然也还未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却已经突破了这种局限，在揭示旧中国尖锐的阶级对立、抨击人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同时，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进行了顽强的、猛烈的攻击，在“五四”反孔斗争中独树一帜，呼啸前进，为我国现实主义新文学奠定了基础。因此它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重视，成为人们长期研究的对象。直到今天，我们学习鲁迅小说的反儒精神，总结鲁迅在小说中所揭示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反孔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鲁迅的思想一度陷入怀疑和苦闷之中。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对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信念和期待逐渐产生了怀疑；而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他也还不可能看到新的革命力量在哪里。如鲁迅所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呐喊·自序》）鲁迅这种寂寞之感，正是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已经完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到来的时代的特点。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在这段时间里，鲁迅以惊人的毅力辑录和研究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系统的研究工作，使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和被吃的历史，更清楚地看到了孔孟儒学的反动、虚伪的本质。这为他后来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坚实的思想基础。

列宁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把鲁迅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从别一个国度里看到了光明的生活，光明的前途。他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坟·我之节烈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虽然“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致许寿裳

信，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歌颂“有主义的人民”，他“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他号召人们抬起头来，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投入新的战斗。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新的正酝酿着的“五四”革命高潮的感召下，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开始站起来呐喊了。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的强烈的反孔斗争精神，使它成了“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在文艺领域内打响了第一枪。

为什么鲁迅要在《狂人日记》里塑造一个具有离经叛道精神的反孔猛士——“狂人”的形象呢？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意义的。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改良派并未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这就是小说里影射的“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结果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镇压下终于失败了。以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革命果实却很快地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大搞“祭天祀孔”，连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也堕落成为“复辟的祖师”，竟然以“当代的孔子”自诩，主张把孔教作为“国教”，载入宪法。刹那间，北京城里“孔道会”、“尊孔会”等纷纷出笼，大肆鼓吹“孔子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等等。面对着封建复辟的紧锣密鼓和尊孔复古的一派狂噪，那时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革命先驱者，前仆后继，决心继续举起反封建斗争的旗帜，“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因此，鲁迅在这篇

小说里所深刻揭示的主题思想和精心刻画的“狂人”的反叛性格，就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的战斗性。实际上，这篇小说的出现，就是在为五四运动的到来摇旗呐喊，制造革命舆论。鲁迅总是精心地研究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特点，针对性很强地反击封建余孽的尊孔复古的叫嚣，回答了五四运动前夕思想文化战线上提出的重大问题。

孔老二反动思想的核心是“仁”。他提出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反动纲领，就是要全面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孟轲根据孔丘的“仁”的思想，发展成了所谓“德治”的理论，提出了“仁政”、“王道”以及后来儒家所标榜的“仁义道德”。这种“仁义道德”的说教，成为历代尊孔的反动统治阶级的“软刀子”，从思想上格杀人民的反抗，妄想永远维持“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秩序。鲁迅通过“狂人”的形象，紧紧抓住了孔丘鼓吹“仁”的要害，对这个“仁”进行了剖腹挖心的揭露。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概括为反动统治阶级“吃人”的历史；而旧社会的一切反动派正是以孔孟儒学的“仁义道德”来掩饰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漫长的黑暗统治。在“仁义道德”的思想统治下，中国劳动人民“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的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一幅劳动人民深受压榨摧残的悲惨图景，正是孔孟之道“吃人”的真实写照。鲁迅在揭露孔孟之道“易子而

食”、“食肉寝皮”的“吃人”本质时，还深刻地指出，代表反动封建势力的决不只是少数的个人，而是一个体系完整、制度严密的统治集团。这一伙人都是刽子手，他们互相勾结，布满罗网，设置陷阱，逼人自戕；他们“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在尊孔与反尊孔的儒法斗争史上，鲁迅第一次鲜明地、彻底地揭露了孔教的“吃人”本质，第一次深刻地剖析了孔孟之道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

《狂人日记》不仅揭露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同时还无情地撕毁了孔孟之道的虚伪面目。从孔丘到历代尊孔的反动派，都总是包藏着吃人的祸心的。小说有力地戳穿了这些吃人的刽子手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的阴险狡诈的卑鄙行径。一句“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淋漓尽致地道出了那伙满口“仁义道德”的人面兽心的鬼魅的特征。

鲁迅愤怒地剥开了历代尊孔的反动派的一切欺骗和隐瞒，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世袭的封建制度，打碎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孔孟之道。为了彻底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罪恶，为了战斗的需要，鲁迅塑造的典型，正是一个被迫害得“疯狂”了的人物，这个形式更便于容纳作者高昂的战斗意志。小说把貌似错乱的语言和实际上是条理清晰的思想，把形似“狂人”和实际上是一个刚强的反孔猛士，这两对矛盾的概念，艺术地统一起来，用含蓄着警句式的语言，熔铸了鲁迅对孔孟儒学最精辟、最透彻的认识和批判，唱出了时代的强音。

这个“狂人，虽然被封建族长们罩上了一个“狂人”

的名目，关闭在一间“全是黑沉沉的”老屋子里，压得他“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但他看出，这是孔孟信徒们惯用的“老谱”，是“吃人”者本性中虚弱的一面。他“挣扎出来”，指出这“沉重是假的”，老屋子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在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迫害、摧残面前，“狂人”从不畏惧，不屈服，“有的是义勇和正气”。他含着悲愤“诅咒吃人的人”，向吃人者连珠炮似地发问：“吃人的事，对么？”“不对？他们何以竟吃？”“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写着，通红崭新！”“从来如此，便对么？”面对刽子手们的凶残恣肆，他“放声大笑”。这勇气，这笑声，这发问，足以把腐朽、虚弱的孔孟之徒“镇压住了”。“狂人”大声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最后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些，都表现了鲁迅彻底推翻封建制度、铲除封建礼教的决心和信心。

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创作成因时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面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致许寿裳信，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可以看出，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指导思想，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鲁迅根据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现实阶级斗争的经验，洞察到了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孔孟儒学的本质是“食人”。因此他要提笔创作去“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惊醒那些被封建礼教紧锁在“铁屋子”里“熟睡的”和“不久

都要闷死了”的人们。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初步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间也还是“寥寥”的，这就更加说明了《狂人日记》批孔反儒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战斗特色。正由于小说“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深深地激动了当时青年读者的心。在五四运动中，真正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了，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鲁迅还以他独特的、犀利的杂文，从各方面无情地批判旧社会，向封建复古主义逆流进行挑战。他斥责那些“好讲鬼话”的孔孟信徒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对以林琴南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即所谓“国粹主义”派，鲁迅更是投以极大的憎恶和无情的嘲讽。他在批判国粹主义者美化反动腐朽的封建文化时说：别国没有，中国独有的东西，未必就是好。“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热风·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形容这些国粹主义者是把红肿的毒瘤当做鲜艳的桃花，把溃烂的脓疮当做精美的奶酪。简而言之，这种人赞赏和保护抽大烟、缠足、纳妾、扶乩等等，把它视之为“国粹”，就是把肉麻当做有趣，把丑恶当做美德。鲁迅明确指出，这种“国粹”，只能是“孱王和孱奴的宝贝”，而与广大劳动人民是毫不相干的；只有把这种“国粹”扫除干净，中国才有望以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猛烈地

鞭挞了那些“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的“儒道诸公”，称这些人是“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他号召革命的青年要敢于冲破封建文化的樊篱，“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热风·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

一幅血淋淋的阶级压迫的现实图画

如果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就是一桌桌数不尽的“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那末阔人们——即历代尊孔的封建统治阶级就是用了孔孟之道这把“软刀子”，“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而“女人和小儿”则是被压在“一级一级的制驭着”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礼教的最底层。鲁迅小说的反儒精神，就是在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生活时，以深刻感人的艺术力量，给读者描绘了一幅血淋淋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现实图画，对孔孟之道压迫和奴役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与儿童的血腥罪行，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揭露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世纪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鲁迅的

许多篇小说，正是遵循着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从本质上反映了毛主席所指出的旧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政权落入代表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北洋军阀手里。北洋军阀政府公开反对民主改革，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尊孔读经”。民国初年颁布的“褒扬条例”中就有“表彰节烈”的条款。直到“五四”时期，在报刊上也还经常登载表彰“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因此反对复古倒退、反对儒家宣扬的反动的“节烈观”，成了当时革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的小说《祝福》，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旧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它所揭示的我国南方农村地主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之间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尖锐性，孔孟之道在中国农村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统治的严重性，以及它提出的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问题的深刻性，都说明了鲁迅在“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文化斗争中，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农民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要性。

《祝福》里的祥林嫂，是旧社会千千万万农村贫苦妇女悲惨遭遇的典型写照。祥林嫂善良、淳朴、勤劳，只渴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度过一生。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祥林嫂，最初被迫嫁给比她小十岁的丈夫。在她二十六、七岁时，丈夫死了，她不堪婆婆的虐待，逃到鲁镇给地主鲁四家里当佣工。她“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可是过不久，她被婆婆家劫走，象牲口一样捆绑起来卖到深山野壤里，嫁给贺老六。虽然她给贺老六家生了一个男孩，可

是不幸接踵而来，男人得伤寒病死了，唯一的孩子也被狼衔去了，她大伯来收屋，便把她赶了出去，她不得不又回到鲁四家做工。

给祥林嫂更沉重打击的尤其是她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另眼相待；她因为嫁了两次，被地主鲁四看成是“败坏风俗的”，祭祀不让她沾手；一些落后的人们嘲笑她，听她诉说悲惨的经历也表示“厌烦和唾弃”。柳妈甚至恫吓她说，将来到阴司去阎罗大王还要将她分尸两段，更使她陷入苦闷和恐怖。为了摆脱这一可怕的命运，她用了自己辛苦积存将近一年的血汗钱去捐门槛赎罪，但是仅有的这一线生存的希望也终于破灭了。她被地主鲁四一脚踢了出去，沦为乞丐，最后消逝在地主们临近年终“祝福”的漫天风雪之中。

人们不禁会问：勤劳善良的祥林嫂，究竟犯了什么罪呢？在孔孟儒家的反动教义里，女人死了丈夫，决不再嫁，这叫“守节”；倘若也跟着自尽，这就更好了，可以表彰为“烈女”。而祥林嫂却不寻死，还出来做工，这便是“罪状”之一。因此地主讨厌她，对她皱眉头。后来她又嫁给贺老六，这就犯了“重适”（即再嫁）罪。宋代反动理学家程颐就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河南程氏遗书》第二十二卷）“女子不事二夫”、“从一而终”，否则就是“失节”。这是儒家反动的节烈观念，是套在中国广大劳动妇女身上的一副沉重的精神锁链。尽管祥林嫂是被迫作为商品卖出再嫁的，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她仍然逃脱不掉“失节”的“罪责”。尤其不幸的是，她的第二个丈夫活不到两年就死去。祥林嫂又被说成是“重婚剋夫”，是“不祥之物”，

“罪过”更大，甚至花钱赎罪都不行。在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的束缚下，她成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反动的节烈观念的牺牲品：族权逼迫她再嫁，夫权使她因再嫁而蒙受耻辱，神权使她精神倍受煎熬，封建宗法统治的政权使地主鲁四之流能把她压榨成“一个木偶人”。祥林嫂就是在这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压迫、折磨下，走投无路，惨苦不堪而死掉的。这血淋淋的事实，就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的最强烈的控诉！翻开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经典，哪一页不浸透了广大劳动妇女的血泪？所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反动虚伪的说教，无不是长期套在妇女身上的沉重镣铐。鲁迅深刻地指出：“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坟·我之节烈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不仅成为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而且，它象细菌一样，深深地渗透到劳动人民的心灵里，浓重地笼罩着旧中国的农村。《祝福》里的柳妈，本来是和祥林嫂一样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人。她深受儒家宣扬的“天命”、“鬼神”等迷信思想的毒害，同时她又不自觉地用这种思想去愚弄和打击祥林嫂。这说明祥林嫂的悲剧有着深刻的

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在小说里深刻揭示了孔孟之道是怎样麻醉和戕害劳动人民的心灵，并渴望改变这种状况，给劳动人民指出一条摆脱精神奴役的道路。

小说《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和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善良的、辛勤的贫苦寡妇。所不同的是，单四嫂子老老实实地遵从了儒家的教条，不再嫁人，幻想“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他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但是无论她怎样忍受封建制度和儒家道德观念的摆布，安分拘谨地守节，辛苦地纺纱，在遇到意外的情况下，同样逃脱不掉万恶的旧社会对她的沉重打击。

她的宝儿死了，咸亨酒店的掌柜、王九妈、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便纷纷伸出魔鬼的手，对她进行了残酷的盘剥和任意的欺侮。王九妈将她家两条板凳和五件衣服拿去作抵，借来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这时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来吃饭，咸亨的掌柜拿走了她的一副银耳环和一支裹金的银簪作保，“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雇来两名抬棺木的脚夫，工钱“每名二百另十个大钱”；至于烧掉四十九卷《大悲咒》等等开销都还不算在内。而地痞流氓如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之流也趁人之危，百般地调戏、欺侮这位无依无靠的寡妇。面对这一连串经济上的敲榨勒索和精神上遭受的欺凌侮辱，单四嫂子哪里还有一条生存的活路！小说《明天》以愤怒的笔触，揭露和鞭笞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控诉了象咸亨掌柜这些吸血鬼的凶残暴虐；同时对于象单四嫂子这样受尽压迫、凌辱的劳动妇女“在这寂静里奔波”、渴望着天明的悲凉心情，也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历代反动阶级的统治术就是利用孔孟之道来迫害和欺骗人民群众的。对于尚未觉悟的劳动人民来说，这种孔孟儒道的精神鸦片则是将他们引向坟墓的“活埋庵”。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针砭封建制度的钢弊，控诉孔孟之道毒害人民群众心灵的严重罪行，并期望劳动人民觉醒起来，打碎孔学的精神桎梏，这是鲁迅在《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中深刻体现的反孔斗争精神。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寄〈戏〉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中指出：“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 他戴的是毡帽。”这一段话，为我们正确地分析研究阿Q的艺术形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阿Q正传》里，鲁迅选择了阿Q这样一个辛亥革命前后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作为主人公，并通过阿Q性格的发展来展开对旧中国农村阶级关系的描写。阿Q是属于“下层社会”的人物，他靠做短工度日。地主们欢迎他是因为他“真能做”。然而“真能做”的阿Q却被地主老财剥削得一无所有，长年寄宿在未庄的土谷祠里，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都有些“渺茫”。所以鲁迅说他“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这是阿Q性格中的本质方面，是阿Q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鲁迅揭示我国南方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描述阿Q所遭受的惨重的经济剥削，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例如，三十岁左右的阿Q向吴妈求爱，这本来是合乎情理的事，但却被赵太爷视为“造反”，似乎象阿Q这样身份的农民就不配娶妻。阿Q求爱的结果，除了挨赵秀才的大竹槓，丢掉了他身上仅有的布衫外，赵太爷还勾结地保借机在经济上对他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地保向他榨取了四百文酒钱，并且订了五项条件：

一 明天用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到赵府上去赔罪。

二 赵府上请道士杖除缢鬼，费用由阿Q负担。

三 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

四 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

正由于封建地主豪绅对阿Q进行了如此惊人的剥削，甚至连他做短工的机会也被剥夺，因此，面对“生计问题”，阿Q又从游手之徒的一群里学会了一点“狡猾”，这是不难理解的。“狡猾”只是阿Q复杂性格中沾染的一层灰尘，就其本质来讲，它依然带着“质朴，愚蠢”的痕迹，所以“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阿Q的性格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这种性格在阿Q身上既是复杂的、矛盾的，又是和谐的、辩证的统一。

但是作为一个农民小生产者，阿Q同样深受那时代的